



广播电视主持人、记者、编播人员的专业必读书

广播语体修辞学

Guang Bo Yu Ti

高歌东 著

Xiu Ci Xue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G222.2

5

Guang Bo Yu Ti 广播语体

Xin Ci Xue 修辞学

高歌东 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播语体修辞学 / 高歌东著.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5.5

ISBN 7-5309-4337-5

I. 广... II. 高... III. 广播语言—修辞—研究 IV. G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7413 号

广播语体修辞学

出 版 人 肖占鹏

作 者 高歌东

责任编辑 匡 威

装帧设计 张丽丽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880×1230 毫米)

字 数 341 千字

印 张 12.75

书 号 ISBN 7-5309-4337-5 / G·3700

定 价 16.00 元



高默东，高级编辑。男，1950年3月出生，山东博兴县人。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系国家语委、教育部语汇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修辞学会理事，天津市语言学会副会长，天津市修辞分会副会长、秘书长，天津广播电视学会理事等职。

曾在省级以上报刊、电台发表、播出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散文数十篇，著有长篇小说《他和两个姑娘的爱情传奇》、《狱火燃烧》、《妙玉传奇》（《红楼梦》续书，武侠小说），还出版了报告文学集《镇妖塔》（合作）等。还参与编写《天津广播电视电影志·广播分志》。出版学术专著《歇后语》（合作）、《学点歇后语》（合作）、《惯用语》（合作）、《惯用语再探》、《学点惯用语》、《新闻广播语言概论》、《广播语言专题研究》、《红楼梦成语辞典》（48万字，与妻合作）、《谚语小词典》（合作）及大型工具书《汉语惯用语大辞典》（153万字，与妻合作），担任《修辞语用探索》（天津市修辞分会论文集）副主编、《修辞与语言文明建设》（中国修辞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主编、大型工具书《语海》（540万字）编委、审订。还完成《惯用语小词典》、《汉语描述语辞典》、《学生歇后语辞典》等书稿，即出。

《歇后语》被列为中国中央电大主要教材参考书，和《惯用语》先后被内蒙古自治区评为优秀图书。《汉语惯用语大辞典》获天津市首届语言学术专著评比一等奖。《语海》获第四届全国优秀辞书二等奖。发表论文五十多篇，有三篇论文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二等奖，有四篇获天津广播电视学会一等奖，有五篇获二等奖。全国有四十余家报刊、电台先后报道其事迹。



责任编辑 / 匡 威

封面设计 / 张丽丽

序

(一)

2005年新年刚过,高歌东先生远道来函,说他的《广播语体修辞学》即将付梓,希望我为他写一篇“序”。我虽然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才认识他,但通过互赠专著,鱼雁往来,已经结下了较深的友谊。尽管我主持的一项大型科研项目正处在分秒必争的关键时刻,因为已经向出版社立下“军令状”,必须准时交稿,但歌东所托之事不应怠慢,于是决定放下手头活计,先拜读他的书稿。

我认为该书最大的特点是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广播语体中修辞方式的运用规律,从而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该书除第一大部分探讨了广播修辞的理论外,其余五大部分是将二十八种修辞方式分别归在“声音类”、“结构类”、“描绘类”、“替代类”、“引导类”等五大类里,从广播修辞偏重于形式方面的因素(声音、结构),到偏重于内容方面的因素(描绘、替代),再到内容与形式结合的因素(引导),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在广播语体中怎样运用修辞手段的问题。此书的问世,不仅为众多的“广播人”——广播记者、编辑、节目主持人等提供了一本非常实用的教材;也为包括我在内的、每天收听广播的广大听众,提供了一本深入了解广播修辞规律的参考读物,可谓功莫大焉!

本书作者从事广播记者和编辑工作多年,对广播中运用修辞手段的特点有着深切的感受,不仅从正面,也从反面体会到修辞技巧在采写新闻稿中的重要性。作者从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中,精选出最典型的事例加以分析概括,并将其上升到规律性的角度加以总结,说服力自然特强。由于广播语言多数是事先写成文稿,然后再通过口播播出,它与纯粹通过视力阅读的书面语言有着明显的差别。有的修辞方式并不适合于在广播中运用,有的修辞方式在广播中虽能运用,但也与在其他书面语体中运用,有着相当的区别。比如,引用修辞格可分为明引和暗引,一般修辞学专著在论及两者区别时,往往以是否带引号作为标

志的;可是广播语言因为是有声语言,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歌东仍从实践中概括出这样的规律:在广播中用有声语言(引用说明语)加以说明的,为明引;没有用有声语言加以说明的即为暗引,这就突出了广播的特点。再如反语修辞格,作者指出在广播中用得不多,因为“广播作品大多要通过主持人、播音员来表达(录音效果除外),而由于主持人、播音员理解文稿有差异,播音艺术有高低,反语常常需要重音表达,稍微把握不好,容易让听众把意思理解反了。还有,广播节目不像报纸,弄不明白可以翻来复去读几遍,广播稍纵即逝,来不及咀嚼、揣摩。有经验的老编辑总是在文稿中有‘反语’的地方标示符号加以说明。但这很麻烦,又怕被马虎的播音员播出去。因而,一般来说,在广播中尽量少用或不用反语”。不过作者也同时指出,广播中有时也能采用反语,在广播中使用反语一般分为“正话反用”和“歹话正说”两种类型。^①再如设问,是书面语体中较常运用的一种修辞手法,但在现代广播中,不能随意运用,因为弄得不好,会显得僵硬呆板,充满说教味道,尤其在直播节目中对它有独特的要求。歌东对上述一些手法均有特殊的总结。更如,广播是声音的艺术,作者在一开头就专立“声音类”一章,专从“摹声”、“叠声”、“音节”、“平仄”、“押韵”等五个角度分节探讨其规律,可说是抓住了广播语体的要害。全书类似突出广播修辞特点的章节很多,读者在阅读中完全可以感受到,恕不赘举。

什么是语体?笔者曾在《试论广告语体的风格特征》一文中指出:“所谓语体,乃是为了适应不同的交际功能而形成的使用语言的某种类型或体式。胡裕树先生与笔者合写的《修辞学与语体学》一文曾经指出:‘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功能、不同题旨情境需要而形成的运用语言特点的体系。’”^②这种“运用语言特点的体系”又是由众多修辞方式(包括修辞格和非修辞格)组成的。那么所谓广播语体,即是由适应广播这一特殊的交际功能及广播这种特殊的语境而形成的运用语体特点的体系,它对修辞方式又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本书以修辞理论和修辞方法为纲建构的系统,是完全符合“广播语体修辞学”的理论和实践的要求的。

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指出,国际上最早的广播事业,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1920年美国匹兹堡建立了全世界最早的商业电台。1923年我国上海也诞生了由外国人创办的广播电台。至1928年春,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诞

生。而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延安新闻广播电台也开始播音。^③七十几年来,我国的广播事业突飞猛进,反映这方面成果的著作林林总总,研究广播语言的专著也有几本问世,但纯粹从总结修辞方式运用规律入手,专门研究广播语体修辞的专著,就我视野所及,本书还是第一本,所以其开拓性是显而易见的。

我从多年来研究中国修辞学史的历程中体会到,我国从秦汉开始,修辞学探索的重点即为书面语修辞,“五四”运动以后,这种局面依旧没有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专门探讨口语修辞的著作依旧如凤毛麟角。可以说,口语修辞一直是我国修辞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在多本拙作和论文中,多次呼吁有识之士及早多多捧出口语修辞方面的专著及论文,以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歌东这本专著的问世,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不正常局面的一种缓解,因为广播是“说”和“听”的艺术,我以为主要应该将其归入口语修辞的范畴,尽管不少文稿是事先书面写就的。

(二)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我与歌东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初次见面时,颇吃惊于他的年轻。因为我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拜读过他和马国凡先生合著的影响广泛的《歇后语》和《惯用语》。在我的推理中,他至少与我的年龄相接近,见面后才知他竟比我年轻二十多岁。这就是说,他与马先生的专著《歇后语》问世时,他才三十岁!这么年轻就出版了高质量的学术专著,这是我的第一次惊奇。

近年来接连收到他惠赠的《红楼梦成语辞典》(与夫人张志清合著)、《广播语言专题研究》,还知道他九十年代曾有专著《新闻广播语言概论》、工具书《汉语惯用语大辞典》(与夫人合著)问世,更早还有《学点歇后语》、《惯用语再探》、《学点惯用语》等出版。在这期间,他还发表了数十篇短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并且著有《他和两个姑娘的爱情传奇》、《狱火燃烧》、《妙玉传奇》、《情缘》等四部长篇小说。《妙玉传奇》(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在电台连续播讲时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以至于电台又应听众的要求而重播。^④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他竟捧出了那么多品种不同的专著、著述和文艺作品。要知道他可是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专职编辑,还当过办公室主任,现在则担任着电台的副书记。白天他要上班,要完成电台繁忙的本职工作!只有在业余时

间里,他才能撰写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这要付出多么惊人的毅力!几十年前,鲁迅先生曾说,他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挤了出来(他吝惜时间,舍不得去参加),才能完成如此多品种的丰硕成果的,没有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拼搏精神,是不可能作出如此大的贡献的。这是我的第二次惊奇。

最近为了写序,我翻阅了有关歌东的一些材料,才知道由于十年动乱等历史原因,歌东当年没有机会进大学。一个没有经过系统培训,完全靠个人摸索而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不付出超过常人一倍、两倍甚至十倍的努力,能达到吗?早在1980年,《山东青年》杂志发表一篇报道高歌东奋斗事迹的文章,作者引用了高歌东的自述:“我的书,是蘸着血和汗写成的。”^⑤这可是对他持久不懈拼搏的最深刻的注脚!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马庆株先生2003年在为高歌东《广播语言专题研究》所写的序中指出:“高先生虽然是自学成才,业余从事语言研究,但是他的成就却是多数科班出身的专业工作者所望尘莫及的。”^⑥于是我才得知,原来歌东是自学成才的,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深造,那是基本成才以后的事了!自学成才而能如此硕果累累,这是我的第三次惊奇。

对于自学成才的学者,我一向都是怀着极大的钦佩。十年动乱前,复旦大学中文系闻名全国的十大名教授中,著名文学批评家郭绍虞、著名语言学家吴文祺(他们分别是一、二级教授),都是自学成才的;我所在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的乐嗣炳教授,也是自学成才的,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他们渊博的学识、谆谆的教诲,都曾给我极大的启迪。修辞学界也不乏自学成才的榜样,例如三十年代作家、著名修辞学史家、香港中文大学高级研究员、年近九十高龄的新加坡华人郑子瑜教授,又如天津师大的硕士生导师谭汝为教授,杭州师院的硕士生导师王占稷教授等等。他们之中,有的我是视为老师的,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则是我的学生。我对他们的奋斗史,一概有着极大的兴趣,因为把它们整理出来,就是一篇篇生动的教材。

据我所知,每个自学成才者在成长的道路上,除了经历过挫折和失败外,也曾面对过无数冷嘲热讽的考验(连非语言专业出身的人研究修辞学,都不断受到讥讽,更别提自学成才的学者了)。但是比起为祖国学术繁荣所捧出的硕果,那一切都算不得什么。历史是最铁面无私的,它会荡尽一切污泥浊水,只留下对学术成果以及对学术成果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学者的记载,而从不计较他

们的学历。歌东顽强奋斗的历程,不是提供了又一次的明证吗?

(三)

我还发现,凡是自学成才者,都极具开拓精神,他们敢于抓选题,也善于抓选题,往往能创造出不少“最早”或第一。歌东不也是如此吗?他的《歇后语》、《惯用语》被誉为“我国第一套有分量的关于熟语的理论著作,为熟语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①他的《汉语惯用语大辞典》被评为“提供了惯用语方面迄今最为详尽的资料。”^②现在这本《广播语体修辞学》也成为所在领域是最早的专著。

开拓创新精神是学术界最基本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精神。没有开拓创新,学术就如一潭死水,止步不前。我国20世纪修辞学的发展,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1世纪的修辞学,更需要发扬这种精神。歌东还年轻,才五十多岁,希望他继续发扬这种开拓创新精神,为我国的学术界捧出更多的硕果。歌东的成功经验还启示我们,在新的世纪里,只要把歌东式的拼搏精神发扬光大,敢于开拓创新,善于开拓创新,不论是具有何等学历的学者,也不论是通过自学成才还是经过正规高校系统培育的学者,都能为我国的学术发展创造出令人称羡的光辉业绩!

注:

① 见本书“五、替代类”中的“4.反语”一节。

② 《宗廷虎修辞论集》第185页,吉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参见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第9-1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④ 见马庆株为高歌东《广播语言专题研究》所写的《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⑤ 管新久《理想的花为勤奋者开——记青年作者高歌东》,《山东青年》1980年第9期。

⑥ 同注④。

⑦ 符准青《汉语词汇学史》第35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⑧ 《语文研究》1997年第1期。

宗廷虎

2005年3月7日于复旦园

前言

我从事广播工作已有多年来。多年来,我在实践中深深感到广播语体(包括电视)修辞的实用价值及其重要性,盼望有一部这样的书来指导像我这样的广播记者、编辑,还有主持人。因为长期以来,研究书面语体修辞的专家、学者众多,著作颇丰,而专门研究广播语体修辞的著作还没有。于是,我便萌发了写一本关于广播语体修辞专书的想法。经过六七年的努力,我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知道我写的书不尽完善,但毕竟是写出来了。我盼望它早日和广播电视的同行见面,盼望它对大家有所帮助,那将使我感到欣慰。

我写拙作采用的是笨办法,所以用的时间长了。我先是广泛搜集资料。而搜集广播节目的文字资料又不像搜集书刊文字资料那么好找,广播节目形成文字的东西或广播稿选毕竟有限,有时还要靠放录音带子获取资料,甚至在收听节目时随做记录,然后整理。而且,近些年来,主持人直播节目得到“大面积开发”,广泛运用,主持人现场发挥的随意性越来越大,其中还夹杂着一些语言不规范的东西,这也为文字的整理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形成广播稿选越来越少,甚至断档的现象。这也是本书引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近两年来资料较少的的原因之一。我在几年来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手头资料进行分类整理,而后把广播语体修辞与书面语体修辞进行比较,找出不同点,根据广播语体特点分析修辞方式,撰写拙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李临定先生曾经说过:“理论产生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先提出一种假设、观点,然后去分析资料,作验证,如果得到肯定,它就成了理论;另一种是,先搜集资料,对它做研究分析,逐步归纳概括成为某种观点、看法,如果是正确的,这也就成为理论。”(见李临定为郭继懋《汉语语句论集》所作《序》)我用的便是后一种办法,这也是我做研究工作的老办法。我感到这样虽然费时费力,但比较有根,心里踏实。对我来说,没有资料的搜集与

001

积累,就谈不到归纳与分析;而没有归纳与分析,也就没有观点和理论。

广播语体修辞与书面语体修辞有着诸多的不同。广播语体的运用途径是通过说出来(或者先写出来后再说出来)实现的,而书面语体修辞则是通过写出来,或者主要是通过写出来实现的。同样,对于它们的修辞效果,前者是通过收听广播来感悟,后者则是通过看(读)来达到。二者的根本不同就在于“说——听”和“写——看”方式的不同。这就与书面语体修辞具有了明显的区别。研究这种区别,找出广播语体修辞的特点和规律,指出应用中需注意的事项,帮助广播电视记者、编辑、主持人(播音员)正确地掌握它,便是本书的宗旨所在。

本书所涉猎的仅仅是广播语体修辞的常见现象。同时,它也融入自己多年来做广播记者、编辑工作的体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拙作又是对自己运用广播语体修辞实践经验的总结。我想,这样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东西也许更有实用价值。

广播和电视是“同族同宗”、“一母同胞”,同属于一种语体,所不同的是电视多了图像这一先天优势。单就语体风格讲,应该归到一个类型中去研究。因此,本书不仅对广播工作者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对电视工作者也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常务理事、天津市语言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马庆株先生的具体指导。中国修辞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语言学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谭汝为教授在百忙之中审读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海内外驰名修辞学家、中国修辞学会顾问、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顾问、《修辞学习》杂志顾问、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宗廷虎教授,目前正忙于一项大型科研项目,而且处于争分夺秒之际。他竟放下手头大作,审读我的书稿,欣然为拙作作序,给我以鼓励与鞭策,令我十分感动。

本书完稿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版问题。如今出书之难路人皆知,著书人更有深刻体会。正在我为此日夜焦虑而一筹莫展之时,天津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肖怀远同志给予了无微不至的鼓励与关怀,他亲自与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的领导联系出版事宜。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肖占鹏同志还请有关专家对拙作进行审阅,最后,决定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如今,拙作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得益于肖部长的关怀,得益于肖局长的支持,得益于天津

教育出版社的帮助。不然,我的书稿至今还会放置在书柜里,让它长期休养。

故而在此,谨向肖部长、肖局长,向宗廷虎先生、马庆株先生、潭汝为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本人学识浅薄,书中难免疏漏和错误,还请语言学界的专家、广播电视学界的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高歌东

2004年6月于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目 录

一、广播人也要学点修辞

1. 广播人为什么要学习修辞 /001
2. 修辞在广播中的应用和研究 /005
3. 广播人怎样学习修辞 /012

二、声音类

1. 摹声 /018
2. 叠音 /027
3. 音节 /043
4. 平仄 /055
5. 押韵 /071

三、结构类

1. 对偶 /090
2. 排比 /104

3. 倒装 /115
4. 顶真 /121
5. 回环 /130
6. 复叠(一) /134
7. 复叠(二) /153
8. 错综 /169
9. 跳脱 /181

四、描绘类

1. 比喻 /190

2. 比拟 /212
3. 摹状 /231
4. 对照 /244
5. 衬托 /264
6. 夸张 /274

五、借换类

1. 借代 /290
2. 移就 /303
3. 拈连 /327
4. 反语 /336
5. 仿拟 /341

六、引导类

1. 设问 /350
2. 反问 /361
3. 呼告 /370
4. 层递 /380

一、广播人也要学点修辞

1. 广播人为什么要学习修辞

著名修辞学家张志公先生早在1953年就说过：“一提起修辞，立刻有人就觉得这玩意儿太深、太玄妙，是文学家的事，跟我没关系，我用不着它，也学不会它。另外一些人却又恰恰相反，认为修辞是‘咬文嚼字’，是‘卖弄文字技巧’，没用处。这两种认识都不正确。”（张志公《修辞概要》第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

当时，谭庸先生也说：“在目前来谈修辞，在一般不明白修辞内容的人，往往会引起两种不正确的想法：一、以为修辞乃是一种非常高深的学问，所以不是一般文化低浅的人所能懂得、所能学会的；二、以为修辞不过是炫耀聪明、玩弄技巧，乃是十分无聊的事，所以不屑学，也不必学。其实这两种想法，都是不应有的误会。”（谭庸《修辞浅说》第1页，北新书局1953年版）

张志公先生、谭庸先生指出的这种现象，到今天依然存在着。反映在我们广播记者、编辑、播音员、主持人队伍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学不学修辞没关系认识。甚至认为，广播是口语很强的语体，强调的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需要的是通俗、明白，用不着人为地去修饰。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广播语言虽然是一种口语语体，但是也应该讲究其艺术性。艺术化了的口语语体，要高于生活本身的口语，是对生活口语的一种再创造，再提高，当然也是一种再规范。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得到印证。

道喜道喜，一下大雨就蹚水的三级跳坑房子，住了这么多年，可算熬出了头，这回搬进了新盖的大楼，岂不是一喜？我们为你高兴，给你道喜。

3月19号这天，是天津市河东区沈庄子街、郭庄子街一带住三级跳坑

房子的将近一百户住户第一批搬家。听了这消息,我们也赶去了。一则,去道喜;二则呢,写个录音报道,叫大家听听,也为他们高兴高兴。

天津市政府决定,今年,要为改善城市人民生活做十项工作。这十项里的第三项就是全面改造市区现有的三级跳坑住房。什么叫三级跳坑呢?就是胡同比马路低,院里比胡同低,屋里比院里低的房子。您没住过这样的房子,体会不了那受罪的滋味儿。一到热天,人们就揪心,下小雨还好,晴了天晒几天儿干了,雨稍微大点儿,院里就泛着水。要是赶上下大雨,坏了!甭多,半拉钟点,雨水就像开了口子,马路(上的水)流到胡同,胡同(里面的水)流到院里,院里(的水)可口儿往屋里灌。一眨眼功夫,屋里的锅碗瓢盆儿漂起来,水没膝盖。有什么法子呢?人们只好请假不上班在家往外淘水。一场大雨过后,少则一天,多则得几天才能把水淘净。一到热天就发愁,一听天气预报说阴天就揪心。(中央台1985年4月12日《各地电台编排的节目》播出,天津台《乔迁之喜》)

这是一篇比较典型的录音报道。说它典型,是指它的口语化、通俗化和“三贴近”的特点比较突出。严青评论它说:“用聊天方式来报道新事物,是天津台的《乔迁之喜》的与众不同之处。天津市的三级跳坑住户搬进新居是件喜事,记者也有一股喜兴劲儿,播音员播得也热火,节目自始至终散发着一股热气儿。”“录音报道的解说没有新闻腔,贴近生活,富于情趣,有点津味,但又不土。”(中央台《各地之声·1985稿选》第200页)

这篇口语性强、通俗性强的录音报道,较好地运用了修辞手段。正因为如此,这篇录音报道才显得更生动、更形象、更富有感染力。

录音报道一开始便说“道喜道喜”,这里“道喜”重复一次,属于修辞格上的复叠手段。给谁道喜呢?下文作了说明。这里又运用了倒装修辞格。这里的“道喜道喜”以复叠形式作铺垫,下文的两个“道喜”再重复,与之相适应,更加渲染了乔迁的喜兴气氛。“岂不是一喜”是反问句。肯定语气的反问可以突出肯定的态度。第二段的“二则呢”的“呢”属于衬词,可以增强口语性。“也为他们高兴高兴”以重复的形式与第一段的“高兴”相呼应,更把喜兴气氛推向高潮。

第三段中“什么叫三级跳坑?”是设问句。其实不问也可以,设问是为了强调下面要解释的内容,使之更加抢眼。下文的话就是对设问的回答。当然也是对“三级跳坑”的解释。它可以帮助听众了解三级跳坑的含义。而下文解释中的“胡同比马路低,院子比胡同低,屋里比院里低”的内容,又恰是一种层递修辞方法,而且是一种表面上的递降,即地势越来越低,实际上是语义强化的修辞手法。它越发说明了住宅的低洼,生动地说明了“三级跳坑”的真实内涵。下文“下小雨还好”至“一眨眼功夫,屋里的锅碗瓢盆儿全漂起来,水没膝盖”,这段话语又是层递手法。它摆出了三种情况、三种结果,“下小雨”的境况、“雨点稍微大点”的境况、“赶上下大雨”的境况,逐步升级,情势越来越严重。而且,其中“马路(上的水)流到胡同,胡同(里的水)流到院里,院里(的水)可口往屋里灌”也是使用了层递手法。“雨水就像开了口子”又是一种比喻,即涌流的雨水和河堤决口一样。这里还用了夸张手法。“一眨眼功夫,屋里的锅碗瓢盆儿漂起来”,“一眨眼功夫”时间太短暂,不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再者锅碗瓢盆儿也不会漂起来,除非锅、碗、瓢、盆儿是铝或者塑料制成的,并且没有盛水。这里都是一种夸张的手法。下文的“一场大雨过后,少则一天,多则得几天才能把水淘净”。也属于夸张。设想,如果说几天才能把屋子里的水淘净,那得有多少水?真有那么多水恐怕也不用淘了,它自己就从窗户、门里往外流了。若是那样,恐怕也不能先淘屋子里的水,得先淘胡同的水,再淘院子里的水最后淘屋子里面的水了。

文中“有什么法子呢?”也是一种反问句。实际所表现的是一种无奈的心情。另外,文中还有几处儿化音现象。如:“滋味”、“晴了天晒几天干了,雨稍微大点儿”、“院里可口儿往里灌”、“屋里的锅碗瓢盆儿”,都含有儿化音的字,更显出口语化的特征。还有句子长短结合,平仄相间,读起来上口,听起来入耳,显得错落有致。

由此可见,广播节目如果能巧妙地运用修辞手段可以使本来不错的广播作品锦上添花,产生更好的艺术性。

也许有人说,一些好的广播稿、广播节目尽管从修辞角度研究很有代表性,但就作者本身来说,也许当初采录节目时并没有有意识地、有目的地运